

# 民生的内涵及意蕴

高和荣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民生”是一个扬弃福利及福祉的范畴,它描述了民众的生活状态,体现社会生活的总体要求,蕴含着社会治理规范,寄托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它所建设的项目与内容、目的及任务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特性。但是,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民生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规范与目标,通过各种民生政策的施行以实现“王道得行”的昌明社会。民生也是浸润中国文化的概念表达,是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提炼,是民族生存文化的描摹与独特性表达,体现出纵向文化关系及结构,是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集中表现,浸润着我们的生存主张与生活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它要求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不断完善与时偕行的福利项目,回应并解决民众的生活关切,让民众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逻辑要求与实践必然,昭示出民族复兴的社会担当与责任要求。

**关键词:** 民生;福利;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4-0096-08

民生作为独具中国风格并为中国人广泛使用的概念是一个兼有认识论与生存论意蕴的范畴。从认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民生的理解有所差异,甚至同一个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民生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从而展示出民生范畴的历史性与发展性特质。当然,民生更是一个生存论范畴,表现为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生活方式的建构以及生活愿景的追求,体现着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诉求与生活期望,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人们有关自身生活的独特表达,深深地打上我们的文化印记,具有鲜明的文化与时代特质。因此,民生范畴本质上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群体意识,揭示着这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生存问题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诉。这就需要我们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准确理解和把握民生范畴所具有的内涵、特性、意蕴及价值。

## 一、民生是历史生成的治理范畴

从历史上看,民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结合成群后对这个群体的生活需要、生活状态的描述以及生活理想的期盼。他所包含的项目与内容、目标及任务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和现实的历史性,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就历史的现实性而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生需要、民生建设实践及其民生状态都可以成为当下民生建

收稿日期:2019-02-1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提高和保障改善民生水平研究”(18JZ043)

作者简介:高和荣,男,江苏兴化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院兼职教授。

设的思想基础、理论资源及经验总结,使得每一阶段的民生建设成就打上历史的烙印;就现实的历史性来说,各个发展阶段的民生都是以往生活史进而是民生史的总结与升华,今天的民生是以往各个时代民生理念、民生观念及民生实践的折光与映射。这意味着民生建立在通晓民生思想、民生制度及生活实践基础之上,是历史的继承性与逻辑的一致性相互统一的范畴,体现出民生范畴形成的历史维度。

首先,民生是早期社会民众的生存需要。按照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民生范畴的提出以及民生实践的展开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由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决定与制约,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而体现出历史的生成过程,是对全部生活史的抽象与概括,民生就是民众的生活史。例如,先秦作为中国历史的早期时代,自然条件恶劣,各地洪水泛滥,人民失去土地房屋等生活资料,犹如《山海经》所言“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在这种情形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sup>[1]</sup>从这个典故可以看到,早期的民生是应对极其低下的生产力的概念抽象,是解决单个个体无力存活的社会举措,民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战胜自然灾害、让民众活下来,存活就成了那个时代民生范畴的核心要义,也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尚书》也认为民生的核心要义在于“勤”和“俭”,做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所以,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早期社会,民生关乎民众的存亡,保障民生就是要能够应对自然灾害、让民众免遭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存活构成了早期民生的核心内容,民生范畴是对早期社会需要的回应,是适应极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要求。

其次,民生描绘了民众的生活状态。生活是人存在于社会并开展社会互动的途径及形式,有什么样的生活,人们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就会凝聚成怎样的社会网络,也就形成了相应的生活状态,民生由此就变成了用以描绘整个社会生活状态的范畴。从历史上看,如果君王实施仁政,那么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物阜民丰、民生昌明;反过来,如果君王行暴政、取民无度,民众终年辛劳却不足以养活家人,则会民生凋敝。就如孟子所说“为民父母,使民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sup>[2]</sup>例如,司马迁《史记》记载了秦二世的统治使得“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而“民不聊生”,<sup>[3]</sup>于是爆发了陈胜、吴广等人的武装起义。东汉时期班固说“民用凋敝,奸宄不禁”<sup>[4]</sup>,描绘的就是当时人们生活极其困苦及民风日下的状态。三国时期,曹操考虑到“禾稼在田”,如果此时发动征战将“恐废民业”,便等“秋成后取之”,<sup>[5]</sup>正是考虑到战争对民生的重创。魏晋时期,周武帝想要施予恩惠给臣民,但被宇文护压制,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人口凋零,劳役赋税繁重,百姓无法生存。于是周武帝感慨说“每思施宽惠下,辄抑而不行,遂使户口凋残,征赋劳剧,家无日给,民不聊生。”<sup>[6]</sup>登上帝位后便借机杀了宇文护。苏轼上书神宗皇帝一针见血地说整个社会已经到了“公私劳扰,民不聊生”状态,“民生已困”“民生惟艰”乃至“民不聊生”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所以,民生是在特定生产力下民众生活状态的整体概括和生活境遇的深刻揭示,折射出人们的生活状态及生活境遇。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会形成何种民生,有什么样的民生状态,也会产生相应的生活,民生状态与生活状态是高度统一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sup>[7]</sup>

再次,民生蕴藏着人们的生活理想。民生饱含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追求,展示民众乐观向上的生活心态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理想追求。尽管早期社会的生产力及物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也挡不住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孔子就曾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sup>[8]</sup>当然,这样的社会景象依赖于君王行“大道”、施“仁政”,依赖于君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子等人主张民生需

要君王“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sup>[9]</sup>其中,“匡其急”包括“养长老 慈幼孤 恤鳏寡 问疾病 吊祸丧”等方面,而“振其穷”包含“衣冻寒 食饥渴 匡贫窶 振罢露 资乏绝”,<sup>[10]</sup>这些都是重要的民生项目。很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贤们的这些主张是高悬空想主义桂冠而不可能真正落地生根。后来,孙中山吸收西方国家的做法,将民生与土地和资本结合起来,强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认为发展民生、建立民生主义国家就是要“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有资本”,“以养民为目标”。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sup>[11]</sup>由此将对民生的理解推进到新的高度,这为科学民生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二、民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民生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状态的总体性概括,其实就是对国家治理下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体现着中国人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方略及治理实践。当然,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一定会形成什么样的民生状态,进而开展何种民生主张、民生策略与民生实践。

第一,民生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人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与主体,治国理政核心要义在于掌握人的本性与规律,引导民众合群、乐群,这是开展民生、安邦定国的前提。《诗·大雅·烝民》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sup>[12]</sup>就是说上天创造了人类使之有着形体与规则,而人的天性则是追求好德。这里的“民”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普罗大众,所谓的“民惟邦本”最终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的生计,让人近仁善邻,安居乐业,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因此要求君王施仁政、扶危弱、保民生,并内化为执政理念和行动方略。只有行仁政、安民生,确立并践行“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sup>[13]</sup>理念,才能把“民本”思想贯彻到底。反过来,不注重民生建设,甚至实施暴政,必然涂炭生灵而失去民心。所以,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sup>[14]</sup>当然,确立民本理念最终要关注民生,让民众能够赡养父母抚育妻儿,“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sup>[15]</sup>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善生养人者”,为此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sup>[16]</sup>管子提出了“九惠之教”理念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施行,使得民生范畴一开始就赋予治国理政的意蕴。

第二,民生蕴含着治国理政规范。民生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描述单个个体的生活,而是君王统治下的社会状态,包含了君王统治臣民的社会规范,体现着对君王开展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某种程度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生内涵之所以有所差异,不仅反映了民众的社会秩序及社会状态,也体现了君王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治理准则。例如,《礼记·孝经》规定,凡为民众防治灾害、救民于水火等,人民就要祭祀他。“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sup>[17]</sup>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讲到,贤明的君王要能够制定产业政策,让民众足够抚养妻儿老小,就要制定治理规范。他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这样“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sup>[18]</sup>梁惠王又问如何使魏国强大,孟子就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sup>[19]</sup>在这里,孟子描绘出一幅国富民强的治理蓝图以及实现这一蓝图的治理规范和治理方略,体现着民生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荀子也强调“等赋”方可“养民”。他说“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sup>[20]</sup>董仲舒劝诫汉武帝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这样,国家“可善治也”。<sup>[21]</sup>王阳明认为,工商绝对不是什么“贱业”,而是保障民生的有效手段,他们与士、农等阶层一起均是发展民生的重要形式,因而与士、农等处于同等地位,“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sup>[22]</sup>,这与黄宗羲等人强调的“工商皆本”如出一辙。黄宗羲等人所说的“本”就是以民为本,是保障民生的根本措

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生从来都是针对社会整体而不只是单个个体,从来都是侧重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而不只是自下而上的福利诉求,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国家治理整个社会的规范而不是任由社会自发行动,它从来都是政治社会学范畴而不只是纯粹福利社会学概念,它是国家治理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延伸,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及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第三,民生体现了治国理政目标。中国语境下的民生不只是个体福利增进的范畴,而是包含着富民强国的治理目标,最终成王于天下。如前所述,先秦时期诸侯频繁争霸,赋税徭役繁重,生产力极其低下,民生艰困,如何保障民众生存下来进而为诸侯国家的统治提供人力物力及财力就成为重要的治理议题。为此,孟子和荀子等人提出“明君制民之产”主张<sup>[23]</sup>,强调薄赋轻敛,“取民有制”,不误民业,“民事不可缓”<sup>[24]</sup>,“无夺农时”<sup>[25]</sup>,以便让民众有固定的田产,使他们可以从事生产活动。在孟子看来,“民本”是实现“王道”治理目标的前提与根本保证。清代学者焦循也提到“恒产者,田里树畜,民则恃以长养其生者也。”<sup>[26]</sup>不仅如此,民生要能够实现治国理政的目标就必须让民众富裕和长寿,“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sup>[27]</sup>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sup>[28]</sup>他要求君王节省费用开支,取消导致民众福利减少的费用支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sup>[29]</sup>;要求全社会范围内大兴教育,研习礼仪,提升社会成员的德行。君王通过实行这些民生措施,有助于实现“王道得行”的昌明社会。

### 三、民生是浸润中国文化的概念表达

历史总具有文化的品格和特性,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的民生,蕴含着我国特有的治国理政理念、方略与行动,因而是一个体现文化特质的概念,是中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它浸润着我们的生存主张与生活追求,凝练成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文化的描摹,体现出中国人的纵向文化关系与结构。因此,对民生的理解离不开这个范畴所处的文化与社会情境。

第一,民生是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提炼。民生体现了生存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形塑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及话语方式,展示这个民族的生存文化特质。各民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丰富性产生了生活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自然产生了“多样化的社会福利理念”及行动。<sup>[30]</sup>反过来,这样的生存文化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观念及生活态度。一方面,民生是对民众生活状态的一种描述,涉及民生兴旺或凋敝两个层面:如果统治者博施济众,百姓人寿年丰,这样的社会就是民生兴旺;如果“民生已困,寇盗未息,兵马驰备,财力并竭”<sup>[31]</sup>,这样的社会就是民生凋敝。另一方面,民生浸润着我们的生存主张与生存文化。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因此,中国人一直主张勤劳致富,希望通过自身辛勤劳动来改善生活,勤劳而不是不劳而获构成了人们的生存主张、生存态度与生存文化,“勤劳生财,团结生义”“克勤克俭,毋怠毋荒”成为中国人的家训并广为传承,勤劳、节俭等构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文化前提与文化手段。所以,《尚书》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sup>[32]</sup>陶潜也说过“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sup>[33]</sup>同时,民生揭示我们的生活理想。中国人的民生不是个人福利的简单相加,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描述,特别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建构,因而我们的民生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很多时候民生所蕴含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愿望甚至理想,是一种理想性的生存文化。例如,老子就认为民生应该做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sup>[34]</sup>。毫无疑问,老子的这一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实现,最多是一种民生诉求与民生理想。《礼记》也提到未来的小康社会应该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sup>[35]</sup>,这里的民生同样也是一种生活理想。

第二,民生是生存文化的独特性表达。民生范畴不是现在就有的,早在先秦时期就业已存在,

不仅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先民们生活态度与生活观念的一部分,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计,因而具有丰厚的文化特性。早在夏朝,针对太康身居大位却不理政事、只顾游乐而忽视民生建设最终失去帝位的情形,太康的五位弟弟作《五子之歌》感叹“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sup>[36]</sup>他们认为,民生连着民心,民生不只是个人福祉,而是民众的日常生计,民生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事关江山社稷。君王应当关注民生,妥善处理好民生,而不能只顾自己享乐,否则将失去民心而断送江山。这应该是有关民生与民心辩证关系的最早表达。《左传》提到楚国的国君“训之于民生之不易”,认为“祸至无日”,要以“戒惧不可以怠”的态度对待民众的诉求,主张用若敖、蚡冒乘柴车、穿破衣开辟山林的精神注重物质资料的生产以保障民生,强调“民生在勤,勤则不匮”<sup>[37]</sup>。这种注重民众生计、积极回应民众诉求的治国安邦之道不仅成就了一番霸业,也使得楚国免遭晋郑两国联合攻打的灾难。由此可见,那时的“民生”就已经用来描述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是个人及家庭难以应对生存挑战而寄希望于君王善政的概念,是民众对君王的生活保障寄托,也是针对治国理政者所提出的责任担当及行为准则,是民众作为君王的子民的朴素要求。要求君王“以民为贵”,把富民当成强国之本,实行有利于民众生活的治理策略,解决民众的生活所需,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做到以民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sup>[38]</sup>因此,民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文化与生存主张。正如孟子所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sup>[39]</sup>

第三,民生体现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文化与民生息息相关,文化来源于日常生活,是对民众日常生计的符号化、仪式化以及抽象化。一方面,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及其组成方式可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民生观念、民生方略及其行动。例如,中国文化是在大一统基础上、注重修齐治平的纵向文化关系与结构,这种文化特质强调个人从属于家庭、宗族乃至国家。这其实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日常生活规范及生活秩序的延伸与总结、概括与提升。他把个人修身当成入群也就是迈进社会的门槛和前提,修身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进个人福祉,更多地是为了合群、能群,修身最终要实现安邦定国的目标和抱负。在这种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民生不只是个人的衣食住行,而是凝练成社会全体生活安康的载体;民生不只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幸福,而是要实现社会整体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民生不是个人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福利的自我建构,而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民生由此就成为实现治国平天下所采取的策略与手段。另一方面,透过民生可以窥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形式。西方国家用“福利”或“福祉”等非集合概念表示民生,这些概念更多地强调个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其福利差距,这与整个西方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横向的、原子化的文化特征有关,也就是与费孝通等人所说的“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团体文化结构有关。<sup>[40]</sup>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人民生计”的民生是一个集合概念,他既不是个体生活境遇与生活状态的描述,也不是个人生活状态及生活水平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关注社会整体发展情况,是社会大众的总体性福利要求,需要治国者对整个社会生活状态、生活水准及生活目标等进行系统化规训与整体性建构,以便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引。透过民生范畴的使用可以清晰地揭示出我们这个民族以“差序格局”为主、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纵向文化关系与结构,表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品格。

#### 四、民生是与时偕行的治理体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思想是时代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致力于壮大经济实力,扩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质量,促进综合国力跃升,为拓展民生内涵以及开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建设提供了丰腴的物质基础。适应社会矛盾的转变,推动政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成为

时代最强音,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抓手与集中体现,由此使得我们对民生的理解打上了时代烙印,民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

一是从理想追求到社会建设的需要。民生始见于物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甚至民不聊生的早期时代,民生概念的提出、民生理念的形与践行侧重于如何保证人口的繁衍与社会的运行。因此,中国早期时代的民生项目更多地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主要关注如何让民众活下来,而不至于出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瘴气侵袭、疾病盛行、哀鸿遍野等惨状,这既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朴素的追求,也是对人类生存首要条件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当然,按照社会科学家的看法,人的生存需要是多层次的,不仅追求“基本需要”还要去追求“中介需要”,<sup>[41]</sup>不仅有“生存”的欲望,更有“自我实现”的满足,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后,又将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不满足于现状并努力去“改变世界”的重要方面。所以,即便在民生多艰的早期社会,人们依然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民生也会指向未来,描绘一幅幅从摇篮到坟墓的美好生活画卷,寄托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路,抛弃计划经济时代下那种区隔型民生制度及民生模式,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生制度及民生模式,致力于补缺型民生项目的建设,期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补齐民生短板。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以及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国家把民生当作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积极布局民生事业,整合社会力量加强民生建设,关切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而多解民生之忧,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解决生活困难群众的兜底型民生制度;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而多谋民生之利,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基本型以及改善型的民生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要务,将民生治理逻辑地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民生建设能力自然就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二是从外在设置到国家治理的要求。西方把社会福利当成个人福利的总和或简单相加,他们的福利建设往往以个人福利为起点,“个人为先”成为西方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实践起点,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增进个体的福利项目、福利待遇特别是福利获得,而较少考虑福利项目供给、福利资金或服务投入是否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完善、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西方的福利建设乃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思维方式在社会建设领域内的集中表现与生动实践,是一种外在于社会有机体的项目设置与制度安排,加上政治选举方式的操作,“福利”成了候选人为争取选票向选民开具的支票,“福利”成了选民关注自身幸福感与满足感的概念而难以提升到治国安邦这个战略高度。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把个体纳入群体并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善于从家、家族、群、国以及天下等社会整体看待社会个体,用具有集合概念性质的“民生”范畴去统摄福利项目,民生不仅仅只是福利项目的机械相加而是福利项目的升华,民生不只是个人生活的保障而是社会运行的手段与可靠保证。因此,我们的民生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针对个体,关注个体的福利项目、福利待遇及福利水平不是“民生”的全部内涵,也不是民生建设的唯一任务与全部任务。我们的民生透过福利项目的设置、生活问题的解决去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目标,我们也关注民生建设对于减少社会排斥、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关注对于社会治理任务的完成、长治久安的促进程度。由此,民生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位移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表征。透过民生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治理社会,而且还架起通往国家治理的桥梁,“民生”成了治国安邦的重要一环。

三是从社会控制到民族复兴的理想。福利天然与社会控制相关,它与监狱、法庭等一样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与工具。因此,福利特别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最初总是面向特定人员,尤其是针对生活困难的群体,最初总是倾向于采取救济或互助方式进行。这不仅是人道及仁政的体现,更是维护政

治统治的需要。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多,客观上要求西方国家的政府提供与之相应的社会福利项目。于是,这些国家不断突破福利供给界限,扩大福利项目、拓展福利内容,从以前的日常生活救济逐步延伸到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福利提供到较高水平及较高层次的福利设置,由此形成了剩余型、制度化型以及工业成就型等多种福利模式,制度化、系统化的福利提供解决了工业化早期阶段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至于对穷人是“施以救济的义务”还是穷人享有“得到救济的权利”则经历了数百年的讨论,<sup>[42]</sup>直到“二战”结束后后者才逐渐为部分欧洲国家所认可,这些国家把“被救济”当成一种“公民资格”“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福利的社会控制功能才有所弱化,而福利的个人效用功能日益凸显。

中国的民生不仅揭示了整个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寄托着民众的生活向往,而且蕴含着国家的治理方略及治理目标,展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理想,承载着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和理想追求。一方面,民生立足于民众的福祉,它从民众普遍关心的衣食住行等福利事项特别是基本的福利需要出发,动员并整合社会力量,与时俱进地建构起福利项目,回应并解决民众的生活关切,让民众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治理方略,民生是治国理政者的社会建构,体现治国理政者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民生要求,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人们会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因而民生是人们对社会愿景的勾画与描摹,并据此展开当下的治国理政行动。这表明,民生建设始终要服务于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民生”是对“福利”及“福祉”等概念的扬弃。从治理角度看,与福利等概念相比,民生是治理本性的回归。透过民生建设可以窥视我们以国为先的治理体系与治理逻辑,充分展示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理想性期待。

我们使用民生概念,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正是传承中国历史与文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治理及社会建设,因而并没有简单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福利概念。用“民生”而不是“福利”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具有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根基,这是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贯彻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不会“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sup>[43]</sup>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 注释:

- [1]《山海经》,周明初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 [2]《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页。
- [3]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73页。
- [4]班固《汉书·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87页。
- [5]罗贯中《三国演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 [6]《周书·晋荡公护传》,令狐德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77页。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 [8]《礼记·礼运》,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19页。
- [9][10][38]《管子校注》,黎翔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195、195、472页。
- [1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3-835页。
- [12]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43页。
- [13]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许慎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
- [14][15][18][19][23][24][39]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17、5、10、17、117、117页。
- [16][20][25][28]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点校本,第589、189、211-212、589页。
- [17]《礼记·孝经》,胡平生、陈美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页。
- [21]《资治通鉴》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60页。

- [2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90年,第1030页。
- [26]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1-102页。
- [27]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0页。
- [29]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3页。
- [30]朴炳铉《社会福利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VII页。
- [31]何景明《何大復先生全集》(下),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1185页。
- [32]《尚书·周书·周官》,顾迁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 [33]陶潜《陶渊明集》,王瑶编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 [34]老子《道德经》,王弼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页。
- [35]《礼记·礼运》,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19页。
- [36]《尚书·五子之歌》,顾迁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 [37]《左传》,郭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3页。
- [4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 [41]多亚尔·高夫《人的需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页。
- [42]郭忠华、刘训练《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 [43]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

[责任编辑:陈双燕]

##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People's Livelihood

GAO He-ro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People's livelihood” is a category that sublates welfare and well-being. It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reflects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social life, contains social governance norms, and embodies people's ideals of life. The projects, contents, objectives and tasks that it seeks to construct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in the pattern and mode of expression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y are historically and realistically unified. People's livelihood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reflects the concept, norms and goal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realizes the “king's wa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people's livelihood policies. People's livelihood is also a conceptual expression steeped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form of cultural refinement of daily life and a depiction and unique expression of the national survival culture, demonstrating a vertical cultural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e. It is also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daily life, infused with the survival claims and the pursuit of life and exhibit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t calls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adap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based on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t demands a response and solution to people's life concerns and thereby enables people to shar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his is the logical requirement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t highlight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ments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people's livelihood, welfare, safeguarding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